

建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 剖析冷戰起源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及其中國研究（1953-1975）*

陳至潔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成立於 1953 年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研中心）是臺灣中國研究與國際研究的學術重鎮。然而在冷戰高峰期間，國研中心實為中國國民黨政府最為信任的敵情與外交智庫，更被國府統治者賦予對外宣傳的任務，以中共情報提供者的身分廣泛參與了國際冷戰的活動，竭力協助國民政府維繫中華民國作為一個相互主觀之國際想像體的身分與地位。本文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理論架構，以 1960 年代臺美雙邊中國研究社群建立合作交流的協商談判過程為案例，為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歷程與其國際角色提供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詮釋。

關鍵字：建構主義、反思論、知識與權力關係、冷戰、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 許多機構對本研究計畫提供協助。中華民國行政院科技部贊助本論文的研究與撰寫（計畫編號：102-2420-H-004-055-MY2）。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華民國國史館同意作者查閱並引用典藏檔案內容，在此鳴謝。本文的完成，有賴研究助理的多方協助，他們包括趙皓嶠先生、林顯明先生、鄭啓瑞先生、周文威先生、楊悅暄女士與盧怡如女士。作者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與指正。作者特別感謝已安息主懷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競涓教授（1958-2015），謹以本文紀念她。

收稿日期：103 年 11 月 2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4 年 8 月 26 日

引言

成立於 1953 年、位處臺北木柵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簡稱國研中心）是臺灣中國研究與國際研究的學術重鎮，也出版臺灣權威的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學術期刊。但是在 1975 年之前，國研中心的前身——國際關係研究所（簡稱國研所）——實為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的政策研究室，屬於黨國情治體系的正式成員，且與中國國民黨最高統治者保持密切的互動。在冷戰結束、臺灣民主化之前，國研中心是中華民國唯一向國內外學者開放閱覽中共資料的機構，更被國民黨政府賦予對外宣傳與外交／國安政策分析建議的政治任務。不同的群體對這個地位特殊、功能繁多的機構有頗為不同的評價：國民黨統治者信任它、中心成員以它為傲、中心以外的學術研究者則與它保持距離（甚至不願與之為伍）。國研中心是臺灣威權時期中國研究的先聲（當時慣稱「匪情研究」或「敵情研究」），也以中共情報提供者的身分廣泛參與了國際冷戰的活動。國研中心是國際冷戰與臺灣威權時期延續至今一個「活著的遺產」（a living heritage），而解釋這個機構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與功能演變，不只有助於推動以臺灣為論述主體的冷戰史與國關研究，更能對臺灣中國研究社群所賴以維繫的知識與權力關係進行批判與反思。

本文探究並詮釋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1953-1975）的制度發展與功能演變，而這是臺灣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第一步。本文的研究範圍雖侷限於單一機構，卻是一個牽涉層面更廣泛之跨學科研究計畫的先聲。本文所呈現的論證與觀點，是一個具有時代價值之宏大議題（即冷戰國際史）的初探。本文首先回顧國研所自 1953 年成立後的制度史，並討論現有與國研所相關之研究文獻的成果與不足之處。這似乎無甚特別的黨國機構史將要烘托出一個令人困惑的發現，即國研所自 1960 年代中期所開始進行的制度轉型。本文主張，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受到亞太冷戰演變與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交叉影響。本文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反思式建構主義（reflexive constructivism）研究典範較能詮釋國研所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因此第二部分首先簡述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典範的核心命題，並介紹反思式建構主義的主要觀點。其中

與本研究最為相關者，則為雙層詮釋模式：反思式建構主義的研究取徑不只探討國際關係中政治身分、利益、政策與行為等國際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同時更深一層地剖析國關知識菁英以何種身分、在何種知識權力關係的條件下建構特定的國際社會事實，以及這些建構過程至終對於臺灣的中國研究社群帶來哪些不可逆轉的深遠影響。

根據反思式建構主義的雙層詮釋模式，本文認為研究冷戰時期國研所的制度發展涉及兩個相互建構、彼此影響的詮釋層次：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層次，以及國際社會事實的層次。本文第三部分聚焦在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層次，探討臺灣冷戰時期的知識與權力關係如何使得國研所成為全球中國研究社群公認之權威研究機構。隨著冷戰格局自 1960 年代中期的改變，中華民國逐漸失去西方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認可，也連帶威脅國民政府的國際生存與統治正當性，國民黨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或「國府」）必須動員所有可能的支持力量以扭轉頹勢。但是，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必須先找出認同該政權意識型態與政治身分的知識菁英以執行此政策。這能夠解釋國府統治菁英為何在 1960 年代中期選擇國際關係研究所——而非其他研究機構，例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執行此一戰略性外宣行動：國研所成員與國民政府菁英都服膺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保守政治理念，形成了一致的世界觀與政治認同，對彼此發展出高度的信賴感，這使得國研所知識菁英的職業發展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前景密不可分。準此，國研所自 1960 年代晚期開始被賦予了更多的任務與資源，從而開始了它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並在 1970 年代進入高速發展期，這是國研中心在 1960 年代中期開始由一個向外封閉的情研諮詢單位轉型為對外接觸的學術宣傳機構的主要原因。

與國研所相對的，則是中央研究院，特別是該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的中國研究知識菁英雖然學術地位崇高，卻因為追求另類的（甚至被認為是敵對的）社會知識與政治理念，導致他們難以與國府統治菁英形成相互主觀的政治身分與論述取向。中研院的知識菁英因此在冷戰時期臺灣的知識與權力關係網路中成為邊緣者，並且不斷受到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政治壓力，因而不能也不願在 1960 年代臺美雙邊當代中國研究合作交流的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兩個研究機構在臺灣冷戰時期知識與權力關係中所處的不同位置，

產生了不同的中國知識，也深刻地影響爾後臺灣中國研究的制度發展與思想演變，直到如今仍然影響了吾人所說具有「臺灣特色」的當代中國研究範式。

本文的第四部分聚焦於國際社會事實的層次，探討冷戰時期中國國民黨政府建構與中國相關之國際社會事實的過程。國府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便意欲藉由主導並形塑國際中國研究知識體系的內容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國政策，以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與其正當性。當時臺灣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使得國研所的知識菁英成為執行這項外宣政策的不二人選。國研所的策略性政治宣傳任務，在於促使國際社會成員（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繼續承認並維護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an inter-subjective imaginability）——即中華民國作為「真實的中國」——的國際生存與正當性；這便充分解釋國研所在 1960 年代中期之後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易言之，國民黨政府以國研所及其學者（作為建構、維繫與傳散特定國際社會知識的菁英）為溝通管道與說服機制，授權他們運用權威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作為一套特定的國際社會知識）而建構並維繫一套國際社會事實，即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華民國雖然僅控制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與其附屬島嶼，卻是「真實的」中國（the “authentic” China），具有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國際正當性。

由於退守臺澎金馬的國民政府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物理基礎（即對中國大陸土地、人民與資源的有效統治），這個「真實的中國」最多只能存在於國際社會成員的想像之中。可以說，此一分析層次所解釋的對象屬於本體論的範疇：國研所學者在國際社會爭辯何為「真實的」中國，以及這個中國想像體的基本屬性。由於這套國際社會事實與當時的國際物理事實完全脫節，至多只能成為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然而「真實的中國」作為一個國際想像體卻可能對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中國政策產生實質、可見的影響力，並決定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正當性。本文的實證研究重點，是要呈現國府藉由國研所去建構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國際社會間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的具體做法與實施過程，至於其成效的評估則較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因其牽涉國際中國研究社群與西方主要國家政府對國府外宣行動的反應，不是本文篇幅與研究資源所能處理的。

本文以檔案實證調查的成果來支持前述的核心觀點。作者將調查重點置

於 1960 年代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爲了建立雙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制度而進行的談判協商過程。這個制度建立過程的參與者（例如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王世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郭廷以、國研所主任的吳俊才等）留下豐富的原始紀錄，充分反映了國民政府在國際冷戰與國內威權雙元結構下，爲了建構並維繫這一國際政治想像體的生存與正當性，便運用其所信賴的知識菁英，希望以學術交流的方式與管道，主導西方中國研究知識體系的議程與內容，進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中國政策的過程。然而，國府運用國研所知識菁英執行戰略性外宣行動，最後仍不敵日益增強之異質性中國論述的挑戰，而以失敗告終（以中共政府進入聯合國、美中建交、臺美斷交等重大外交事件爲證明）。

本文的結論部分除了回顧研究成果之外，也將探討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爲詮釋框架的國研所檔案研究，對臺灣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時代意涵與知識價值。作者認爲以國研所歷史檔案爲基礎的研究問題與所做觀察，對當下臺灣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至少有三重的意涵。第一，這樣的研究將有助於催生臺灣冷戰史研究社群的建立與茁壯；第二，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爲詮釋框架的中國／國關研究，可以與現今臺灣政治學社群裡的「中國學」進行對話與相互學習；第三，本文可促使華人社會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學者開始將知識與權力關係納入經驗研究的範疇內，使得中國研究／國關研究知識菁英與政治菁英的互動條件、機制與模式成爲學術研究的題材。

壹、冷戰起源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冷戰結束、臺灣走向民主政治之後，坊間對國研中心的人員與功能已有些獵奇式的報導，其內容均將國研中心描寫爲最受中華民國政府信任的外交國安智庫，與中國國民黨政務官的非正式培訓所（張實，1990: 26-27；陳煥然，1990: 27-28；曾熾卿，1994: 108-110）。國研中心退休人士以及曾經與國研中心有工作關係的退休官員亦曾發表與國研中心有關的回憶或評論（佚名，1992a: 112-115; 1992b: 131-133；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1990；張炎憲、許瑞浩，2009: 168-173; 246-253；邵玉銘，2013: 233-248）。但是直到

2014年，才出現以國研中心（與其前身國研所）為嚴肅調查對象的學術研究成果（劉曉鵬，2013: 145-174；Chen, 2014: 89-121；Liu, 2014: 55-88；Kou, 2014: 9-53）。以國研中心與其中國研究範式為分析對象的學術研究，目前仍在起步階段，而這已有相當難度。

現有針對國研所的研究文獻著重在理清國研所於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史。例如，劉曉鵬（2013: 147-159）發現國研所在組織原則、功能設計與人事運用上承襲了抗戰時期成立的情報分析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IA）。在組織原則上，國際問題研究所與國際關係研究所（1953-1975）承襲了蔣中正建立組織的風格，亦即都遊走於正式體制與非正式管道之間：一面來說，兩個單位名義上僅是中層情研機構，卻都直屬於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即蔣中正與到臺灣之後的蔣經國。因此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得以時常越級直接面交情報分析與政策建議給蔣中正與蔣經國。在功能設計上，這兩個單位除了提供國關與敵情研析與建議之外，也都被兩位蔣先生賦予國際情報合作、國際宣傳、爭取國際認同的任務。在人事運用的方式上，國研所不只有原先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成員，兩個機構也都以曾經效力於敵對陣營、而後遭捕俘或變節者為其情報研析的主幹（例如日本人、臺籍人士，以及中共成員）。

又如，陳至潔（Titus C. Chen, 2014）與寇健文（Chien-wen Kou, 2014）以國研所典藏的冷戰時期檔案為基礎，試圖解釋該機構在1960年代晚期開始的功能蛻變與其對臺灣中國研究的影響。他們認為國研所由一機密的情研戰規機構轉變為一對外公開的國際宣傳與學術交流重鎮，是以1970年為分水嶺，因為國研所在該年底舉辦了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研討會」（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SACMC，簡稱中美會），此後年年舉辦，還以此會議為藍本，成立其他類似的雙邊中國研究學術交流會議。陳至潔推測國研所的改制與當時國際與國內的結構因素有關。然而，現有文獻僅使用了國研所典藏的部分檔案，它們對關鍵事件的詮釋便不可避免地較為片面（甚至有誤），也無法充分解釋關鍵事件的原因與進程。例如，陳至潔（Chen, 2014: 102-104）發現國研所主任吳俊才曾在1966年向蔣經國建議允許國研所與中央研究院合辦國際性的中國大陸情勢研討會，但蔣經國不贊成。陳至潔認為

吳俊才與蔣經國溝通的過程呈現出一個極不平等的權力與知識關係：在冷戰格局與獨裁政體的雙重結構之下，權力的擁有者決定了知識分子的活動性質、方式與範圍。但是陳至潔並未解釋吳俊才為何希望與中研院合作，以及為何在 1966 年提出此要求；對於吳俊才想要舉辦國際性中國大陸情勢研討會的動機，陳至潔提出的解釋也不準確。而且，由於陳至潔沒有探索中研院在冷戰時期臺灣中國研究的政治定位，他就無法解釋為何蔣經國拒絕與中研院合作籌辦國際中國研究會議。最後，現有文獻作為開拓性的研究，主要的貢獻在於描述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史，並由此討論在專制政體下權力與知識關係的特性及其社會建構過程。然而，現有文獻並未解釋這種權力知識關係的政治目的。換言之，現有文獻部分解答了國研所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這些事如何發生」，但沒有令人滿意地解釋「這些事為何發生」。

解釋歷史發展的路徑與方式需要吾人掌握更多、更完整的檔案，因為檔案從來就不是孤立的。與某個重大事件或重要政策有關的公文會分散出現在不同的黨政軍機構，冷戰史學者必須由這些單位取得檔案，加上當時重要決策人士或利益攸關者的日記手稿等個人資料，方有可能釐清各機構與各政治人物對該事件或該政策的立場與看法，進而對該事件或該政策的發展做出有憑有據的解釋。因此本文以現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運用新發現的史料與檔案，進一步探索國際關係研究所為何能在日益艱困的冷戰大局勢，以及不對稱的權力與知識關係中進行體制改革與功能擴張。本文擴大檔案研究的範圍，除了持續運用國研所尚未開箱的檔案，還使用國史館典藏的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文物，以及總統府、行政院與中央研究院公文，再加上王世杰、郭廷以等當時重要學術領袖的個人檔案，最後對照中研院近史所研究人員在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然而光有檔案是不夠的，吾人亦需要具有穿透力與洞見的詮釋框架，才能為國研所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提供有說服力的實證解釋，而非僅只是推論。

貳、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研究典範的詮釋架構

作者認為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典範——特別是反思式建構主義 (reflex-

ive constructivism，或譯為反身式建構主義）——較其他國關理論更能夠解釋國研所在 1960 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制度變革與功能擴張。自 Nicholas G. Onuf 在 1989 年出版了 *World of Our Making* 之後，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有別於主流國際關係研究典範的另類國際關係主體論便受到國關學界的注意，形成了 Lapid (1989: 235-254) 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辯論。建構論在 1990 年代開始受到歡迎，是冷戰後期北美青壯輩國關學者批判主流國關研究典範的結果：他們認為主流國關研究典範漠視新興國關議題 (Cox, 1986; Ashley, 1986; Keohane, 1988: 379-396; Pettman, 2000: 69-147; Finnemore and Sikkink, 2001: 391-416)，也發現主流的國關研究重點無法解釋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國際重大事件 (Gaddis, 1992/1993: 5-58; Lebow, 1994: 249-277; Herman, 1996: 271-316; Guzzini, 2000: 154-155)。主流國關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貧乏，使得青壯輩學者向主流國關研究典範以外的知識來源尋求靈感與幫助。¹

建構主義是一套本體論，是一套認識社會世界的方法 (approach)，而不是具有普遍性質的理論 (generalized theory) (Onuf, 1998: 58-59)。不同的建構主義國關學者關懷不同的議題，向不同的學科或哲學汲取思想上與研究方法上的養分，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發展出多元複合的研究取徑，包括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其中之一便是反思式建構主義。如同建構論，反思論 (reflexivism，但直到 1990 年代初期亦稱 reflectivism) 是一套認識世界的方法，且兼具認識論與本體論的內涵。反思論源自於批判社會理論 (例如法蘭克福學派、Pierre Bourdieu、Michel Foucault 等) 與知識社會學 (Bigo, 2011: 225-258; Madsen, 2011: 259-275; Hamati-Ataya, 2012: 625-646)，主要指涉人們產生「社會知識」(social knowledge) 的實踐及其社會效應：人們對於周遭社會事實 (social reality) 所進行的心智反應——觀察、描述、分析、解釋、理論化等——將會影響社會事實本身的演變。反思論者認為社會既是由人所建構，則人們的世界觀與認識世界的方式——他們的心智世界 (intellectual world)——將會影響社會世界 (social world) 實際的運作過程及其制度結果。

1 有關當時北美青壯輩國關學者對理性主義國關研究典範的集體挫折感與焦慮感，是筆者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與教授建構主義或社會科學哲學等相關領域之學者 (例如 Cecelia Lynch, Wayne Sandholtz, Patrick Morgan, Kristen Monroe, Nicholas Onuf, John Gunnell 等) 討論而得知。

在反思論的認知下，知識與事實相互構成彼此，知識與事實是相互照映的本體，而社會事實也無法自外於人們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而存在（Hamati-Ataya, 2013: 678-679）。反思論的研究典範因此打破了理性主義者所強調的能動者——結構分離命題，也挑戰了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強調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分際，以及研究主體保持客觀、價值中立的倫理可能（Jackson, 2008: 129-153）。準此，以反思論為理論基礎的國關經驗研究，會著重於分析那些產生並傳散社會知識的條件、機制、過程與其改變國際社會事實的制度性結果。

由反思論的視角來看，國際法、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ules）或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s）可被理解為構成當代國際關係的社會知識，經由國際機制／制度的實踐而建構（或改變）了國際關係的社會事實。注重國際制度的建構主義國關學者因此著重研究國際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是如何解釋與推廣他們認為有益於國際和平與發展的理念，並藉由建構國際社會的論述而影響各國的利益與政策，至終改變國際社會事實（Haas, 1992: 1-35）。這種研究路徑——強調國關知識菁英改變國際社會現實的**機制、過程**及其**政策結果**——直到世紀之交都是反思式國際關係經驗研究的主要呈現方式（Adler and Haas, 1992: 367-390）。²

但是反思式國關研究的探索焦點不僅在於檢視專業菁英與政治菁英的國際社會知識是否——以及如何——改變（或建構）國際社會事實，更在於認識國關學術菁英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改變（或建構）國際社會事實（或者，國際社會事實是在何種**條件**下改變或建構國際社會知識）。後者帶有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的性質，幾乎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國際關係場域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knowledge-power relationship），但這卻是 1990 年代反思論國關學者所忽略而不去審視的，因為這些學者的經驗研究仍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先驗假設與功能主義研究方式。

21 世紀開始，隨著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學者（例如 Ido Oren, Stefano Guzzini, Brent Steele, Inanna Hamati-Ataya 等）發表作品，反思論在國

2 有關社會科學具有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的性質，請見 Giddens（1984: xxxii-xxxiii; 285; 349-350）的討論。

關研究領域開始步入新的、更具企圖心——或是這些學者所稱較「濃郁」的反思性質 (**strong reflexivity**)——的研究典範 (Hamati-Ataya, 2014: 153-156)。一股「反思論的潮流」開始席捲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義著重研究國際關係基本概念 (作為一套權威的國際社會知識) 與國際社會事實兩者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及這個相互建構過程所需的物質與理念**條件**。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將國際政治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加以陌生化而成爲經驗／檔案研究的對象 (Hamati-Ataya, 2013: 679)，因爲他們在經驗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政治科學——特別是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次領域——的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幾乎無可避免地被強勢政治體制與政治菁英所制約，甚至操縱。那些歷來被認爲具有普遍性質的政治／國關概念 (例如民主，以及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在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的筆下，變成了知識與權力在國際場域中相互建構過程下特定時空與意識型態的產物：這些基本政治／國關研究概念的內涵不只會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也會隨著政治菁英的更迭而更迭，甚至會因爲意識型態立場的改變而改變。³

掌握國際社會知識詮釋權的國關專業菁英，與掌握國際政治資源支配權的統治菁英，以相互主觀的意識型態或政治理念爲基礎，建立共享的政治身分與利益格局，在特定時空之下結爲同盟：國關知識菁英藉由服務他們所認同的政治體制而獲得大量的軟硬體資源，統治菁英則因爲開發並運用學術社群的研發、分析與論述潛能，而鞏固了本身的國際生存與統治正當性，也建構並維繫了特定的國際社會事實。爲了防止異質性的社會知識藉由論述動員或政治過程而改變現存的社會事實，統治菁英會有系統地吸納、壓制或迫害那些堅持另類政治身分與理念的知識分子，這也顯示了一個在相對能力與政治地位上極不對稱的知識權力關係。簡言之，學術菁英與政治菁英在國關場域中的合作建構且維繫了特定理念的知識霸權地位與政策影響力，並藉由論述策略而促成特定國際社會事實的出現或延續 (Dezalay and Garth, 2011: 276-293)。⁴

3 最近的例證即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簡稱 WMD) 這個名詞的流行，請見 Oren and Solomon (2013: 109-135)。

4 關於知識菁英與統治菁英如何運用價值觀、政治身分與相互主觀的想像體去影響外交政

政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在國際關係場域中猶如對鏡自照般地合作，而國關知識菁英的職業發展與其專業社群的成長，都與政治菁英的恩庇與馴服脫離不了關係。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所關切的，是兩層彼此有所分別、但又相互影響的社會建構過程：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不僅探討國際關係中政治身分、利益、政策與行為等國際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且更深一層地剖析國關知識菁英以何種身分、在何種知識權力關係的條件下建構特定的國際社會事實，以及這些建構過程至終對政治科學／國關研究社群帶來哪些不可逆轉的深遠影響（Cull, 2008; Hamati-Ataya, 2011: 259-287; Oren, 2003; Saunders, 1999）。

然而到目前為止，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或解釋框架的經驗／檔案研究並不多，而新一代反思論國關學者仍將研究與出版的重心放在理論的闡述，希望催生出一套能與理性主義分庭抗禮的反思主義國關研究典範（Hamati-Ataya, 2011: 259-287; Guzzini, 2013: 521-541）。而且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較為忽略的一個現象，就是國際社會幾乎從未被單一的知識霸權體系所壟斷，而總是存在著多個性質各異或是立場相左的知識體系。而建構並維繫這些國際社會知識體系的各個知識與權力聯盟，便在國際場域中結合物質力量與論述能力去爭奪典則制定（rule-making）與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的權力，以取得國際知識霸權的地位，並將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轉變為國際社會事實。易言之，另類的社會知識並不會從國際場域中徹底消失，即使是取得霸權知識體系地位的知識與權力聯盟，也難以完全斬除那些異質性的、或帶有抵抗性質的另類論述。將國際社會知識建構為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國際社會事實，是一個充滿挑戰、抗拒與不確定性的過程。而且當一套社會知識在某一層級（或某一區域範圍）取得霸權的地位，在另一層級（或是全球範圍）卻可能還是眾多另類知識中的一個。也因為如此，吾人必須將特定知識體系的國際地位視為一個需要查驗的實證性問題，而非一個不證自明或恆常不變的先驗性說法。

策，可見 Bettiza（2014: 3-4）對於文明政治（civilizational politics）的探討，以及 Steele（2007: 901-925）對美國政府援助南亞海嘯災民之過程的研究。

以反思式建構主義作為研究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研究所制度演變的詮釋框架，是頗為合適的，因為前述反思式國關研究典範所關注的核心議題，都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國研所的制度發展過程之中。反思論的雙層詮釋模式，也為研究國研所冷戰時期制度發展的學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解釋途徑。而反思式建構主義需要改善的理論缺陷，也具體呈現於國研所的案例中。準此，國研所可說是檢驗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研究典範是否能夠由理論探索延伸至經驗／檔案研究的指標性個案。

參、國研所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一座島嶼、兩種想像

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義者關注國關知識菁英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改變國際社會事實（或者，國際社會事實是在何種條件下改變國際社會知識的內涵與國關知識菁英的身分）。這些問題幾乎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國際關係場域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準此，冷戰時期國研所學者建構並維繫國際上相互主觀之中國想像體的理念與制度條件，便是國研所當時所處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今日吾人可藉由閱讀並比較國研所典藏的檔案與同時期的黨政機構歷史紀錄，來研判國研所在臺灣冷戰時期知識權力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國研所核心成員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理念。

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何選擇國研所——而非其他機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去建構攸關中華民國生存的國際論述？國研所並非偶然地獲得國府最高當局的青睞。如前述，國民政府自 1960 年代起，開始藉由主導國際中國研究知識體系的發展方向與研究內容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國政策。但為了要使這套有利於國府統治菁英的中國論述成為國際社會事實，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必須先找出認同該政權的國關知識菁英以推廣、傳散這套中國論述。易言之，統治菁英必先確定所控制並運用的知識菁英擁有與他們一致（或至少是高度類似）的政治認同與國族意識型態，才能轉移資源與執行政策。國研所的知識菁英完全符合這樣的期待，這由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史得到相當的明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及五年，統治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便在內

戰中潰退，於 1949 年敗走臺灣，失去了對中國大陸領土、人民與資源的有效控制。在內戰中獲得全面勝利、據有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不只在北京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以下簡稱「中共政府」），更建立了新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府向國際社會宣稱中華民國及其國民政府已覆亡，並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中共政府在國際間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國民政府與中共政府之間歷時數十年的中國國際代表權爭奪戰就此揭開。1949 年 6 月，當時仍在「下野」狀態的蔣中正，決定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成立「總裁辦公室」（李甲孚，1994: 124；蔣經國，1988: 93-94; 108）。同年 8 月總裁辦公室成立於臺北草山，下轄八組一會，並在第一組的編制下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由第一組副組長蔣經國擔任主任，用以整編並改造當時潰散無序的國府情治單位（蔣經國，1992a: 168; 1992b: 386；涂成吉，2007: 99-101）。政治行動委員會對外的名稱爲「總裁辦公室資料組」，但是在總裁辦公室內部的通稱則是「情報組」（國史館，1949）。當蔣中正於 1950 年 3 月在臺北「恢復行使」總統職務後，總裁辦公室第一組便改制爲總統府機要室，而政治行動委員會也改編爲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仍由蔣經國爲主任，負責督導、協調國民政府各情治機構的工作。

同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冷戰衝突在西太平洋迅速升溫，美國杜魯門政府先是決議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造成臺灣海峽中立化現象，繼而在 1951 年 5 月改變對臺政策，提升臺灣在美國西太平洋冷戰佈局的戰略重要性，將臺灣視爲圍堵國際共產運動擴張的前線，並決定加強臺灣的防衛力量，大幅增加對臺美軍援助（張淑雅，2011: 83-87; 150-153）。到了 1951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已正式稱呼在臺灣的政府爲中華民國政府，並承認在臺灣執政的是一中國政府（張淑雅，2011: 173-179）。1952 年春天之後，國民政府的戰略與政治價值在美國冷戰架構中更形提升：華盛頓已認定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可以被持續改造精進，最終成爲東亞重要的反共資產（張淑雅，2011: 196-203）。蔣中正總統領導的國民政府在臺灣獲得喘息空間，待其國際政治地位獲得保障，又自 1952 年開始獲得大批美國軍經援助，便恢復對中國大陸的攻勢戰略規劃。

然而蔣中正不滿意於國民政府情治機構的冷戰局勢分析與戰略建議；他

自 1952 年春便要求蔣經國改善國府的情研戰規品質，復於 1952 年 11 月、1953 年 2 月兩次手令蔣經國成立一高級敵情研析與長程戰略規劃機構（國研檔案館，1953a; 1953b; 1953c）。「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研究室」便於 1953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接受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的直接領導，在國府內部代號為「遠廬作業室」，主要任務是蒐集、整理、分析中共發展與國際共產運動的態勢，就此向蔣中正與蔣經國做出政策建議，並出版國府內部刊物《問題與研究》及《匪情月刊》，且不向外公開其活動。⁵ 1955 年 3 月，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改制擴編為總統府國家安全局，隸屬於國防會議（1967 年後更名為國家安全會議），資料組研究室也改隸，並更名為「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策研究室」或「政研室」）（國研檔案館，1964d）。為了掩蔽政府情治單位的敏感身分，政研室在成立之初即獲總統府資料組授權，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名義對外聯繫（以下簡稱「國研會」）。1957 年下半年復經蔣經國同意，在 1958 年 2 月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稱向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以便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57a; 1957b）。這是國際關係研究所在 1950 年代的前身。

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早期制度發展史清楚地顯示，該機構是中國國民黨最高統治者直接命令下的產物，是兩位蔣先生個人意志所造就的單位，是國民政府統治者所嫡生的機構。國研所被創造的目的完全是為著協助蔣中正的軍政戰略規劃，可說是蔣中正的個人情研戰規機構，由蔣經國直接督導（國研檔案館，1953e）。而且國研所早期的核心成員，多是中國國民黨的資深對外宣傳工作者（例如邵毓麟、李白虹、鮑靜安），或是與蔣經國有個人情誼及長期共事經驗者（例如卜道明、馬星野）。⁶ 準此，國研所的核心成員與國民政府統治者分享了相同的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專制保守的政治理念，強調中國人的自我認同與支持獨大專斷的行政權。易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者與國研所成員擁有一致的世界觀與政治思想，發展出高度重疊的政治身分。他們信任彼此，並發展出交織密切的人際網路，他們的關係猶如對鏡自照。國研所知

5 因此國研所檔案多與中共、俄共及中華民國外交情勢的情報分析有關。

6 有關國研所早期核心成員與國府統治階層之親密關係的源流，劉曉鵬（2013: 163-170）的論文有詳盡的考證與討論。

識菁英的職業發展也與國民政府的發展密不可分，而知識菁英與統治菁英的合作也建構並維繫了「真實的中國」作為國際成員間相互主觀之想像體的政治正當性與政策影響力。

威權專制體制維繫了一個極不對稱的知識與權力關係，知識菁英在其中幾乎沒有自主空間；他們既難以抵抗或撼動統治菁英的權力，便只能在扈從與避走之間做出選擇。國際關係研究所卻是臺灣冷戰威權時期的制度獲益者，因其成員的國族意識型態與政治理念與中國國民黨統治者的一致，而他們的專業知識與論述技能又對國民政府的國際生存有所助益。國研所知識菁英一面分享國民政府的政治理念與國族意識型態，另一面則是在國際事務上自願地、積極地襄贊國府統治菁英。因為蔣中正與蔣經國的重視，國研所在臺灣冷戰時期的知識權力關係中佔據了極為有利的地位，擁有龐大的政治與物質資源，以及無人可比的政策與學術影響力。蔣經國直到他擔任行政院院長以前，都特別重視與中心核心成員保持制度上與個人之間綿密的聯繫。國研所典藏的歷史檔案顯示，自 1953 年到 1967 年，蔣經國親自視察單位業務並發表政策指導的紀錄就達 31 次，更出席每年 4 月 1 日的所慶活動。蔣經國不只親自督導國研所，還將他認為最重要的政策研究工作交辦給國研所去研究或執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成立與運作是一例，本文第四部分所觸及的中美會與中日會是另一例，1972-1975 年期間在國研中心成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研究小組又是一例。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政策影響力的擴張，主要是因為核心成員與統治菁英之間所發展的緊密、彼此信任、相互主觀的扈從關係。

與國研所相對的，則是中央研究院，特別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的知識菁英雖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共享中國國族意識型態，但在政治理念上則明顯地站在國民政府統治菁英的對立面：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世杰與中研院近史所所長的郭廷以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也保有濃厚的中國國族認同，但不認同國民政府的專制作風與限制人民基本自由的做法。在政治理念上，他們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與國府統治者沒有相互主觀的情誼。抱持另類政治理念與異質政治身分的中研院知識菁英們無法反抗國府統治者的專制權力，只能選擇避走權力，既少參贊機要，也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保持距離。在知識社群裡，中研院近史所學者與國研所研究員雖然有著類似的研究對象

與興趣（都研究中國近代史與當代政經發展），卻在工作上無甚交集，人際之間亦殊少來往聯繫，且對國研所政府情治背景頗不認同（郭廷以，2012: 265）。中研院的中國研究學者們也因此臺灣冷戰時期的知識權力關係中成爲邊緣人，難以獲得國民黨政府的行政與財政資源。⁷ 面對高壓的專制政府與邊緣化的政治地位，中研院的中國研究學者只能戒慎恐懼地將研究注意力集中於較不敏感的中國近代化研究議題與中國近代史料整理工作，而不敢碰觸極度敏感的中共研究、國共關係研究與當代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的研究。⁸

物資的匱乏與研究上的瓶頸，促使中研院及其近史所學者們選擇與美國自由派漢學界交流合作（例如福特基金會在 1962-1971 年間與近史所的兩個五年期合作交流計畫），他們的生活待遇以及工作成果因此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與他們合作的美國學者，有不少是國民政府的批評者與中共政府的同情者（例如費正清，即 John King Fairbank，曾在 1960 年與 1964 年訪問中研院近史所），中研院中國研究者的政治忠誠度也因此受到國民政府統治菁英的質疑，另類的政治理念被當局視爲對立（甚至是敵對）的政治傾向，至終惡化爲政治風暴（張朋園，1995: 100-106；楊翠華，1999: 55-59; 65；黃克武訪問、周維朋紀錄，2004；沈懷玉訪問、簡佳慧紀錄，2004: 125-130；沈懷玉訪問、周維朋紀錄，2004: 219-230）。

1967 年 11 月開始，中研院院長王世杰的日記中不斷出現國內特定人士攻擊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與美國自由派漢學界合作研究之事（王世杰，2012: 1190）。這些人士對郭廷以、胡適等人的抨擊，也兼及王世杰，風波所及，連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都在 1968 年 1 月的例會上對此案討論甚

7 有關中研院近代史學者對國研所成員的觀感，雖不見於已出版之研究文獻中，但近史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則在其日記中明確表達不認同及不願與之爲伍的負面看法，而這樣的看法也爲近史所資深研究員張朋園所證實。在 2014 年 7 月 14 日的訪談過程中，於近史所創建時期便進入所內工作的張朋園研究員，向筆者表示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的學者們都盡可能地與國研所保持距離，不願出席該機構舉辦的活動，因爲他們不認可國研所的學術價值與該機構所代表的政治理念。

8 因此，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便選擇與他的好友、時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的羅家倫合作，爲清季民初外交檔案編纂目錄，經費由美國十個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共同擔負，終於在 1967 年 5 月完成十本的《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成爲近史所在 1960 年代的代表出版品（張朋園，1997: 41-48）。

久，王世杰為該組成員，頗覺困擾與挫折（王世杰，2012: 1199）。他在同年2月致信蔣中正總統，為中研院與美國的合作交流提出澄清與辯解，但是作用不大；王世杰認為總統府與行政院在面對立法委員抨擊中研院時，都不加以反駁（王世杰，2012: 1203; 1205; 1207）。1968年10月，王世杰日記記載何浩若、侯立朝、徐高阮等人指控王世杰為第三國際共產派，且已被親共的美國漢學界領袖費正清收買利用（王世杰，2012: 1230）。同年11月，王世杰在日記上憤怒地宣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在《陽明》、《現代》、《文化旗》、《中華雜誌》等刊物上刊登攻擊中研院與王世杰的文章（王世杰，2012: 1232）。由於這些雜誌都與情治機構（特別是國防部情報局）關係匪淺，極易讓外界認為國府不再信任中研院學者的政治忠誠（王世杰，2012: 1236）。王世杰憤而向蔣中正總統請辭中研院院長，而他的日記記載總統府對他的辭案竟不置可否，也未強力慰留（王世杰，2012: 1235）。

這樣的發展直到1969年底都未停歇，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在1969年仍然就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與美國漢學界合作交流案向政府提出質詢，並藉媒體公開抨擊，甚至將懷疑的焦點延伸至當時臺灣大學的校長錢思亮，使得王世杰及郭廷以都認定局勢對他們不利，即使是郭廷以與蔣經國數十年的私人情誼也無法令他感到安全（王世杰，2012: 1238; 1274; 1288）。而這也可以說明蔣經國為何自1966年底，便迭次提醒國研所主任吳俊才，不可與中央研究院及其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臺美當代中國大陸研討會（即中美會，在本文第四部分有詳述）。蔣經國甚至直接否決中研院學者以個人名義擔任中美會學術顧問的建議（國研檔案館，1966d），並警告吳俊才在籌辦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時，「必須防止自由主義份子滲透」（國研檔案館，1968a）。

就在同一時段，中共政府已從文化大革命的紛亂中回神過來，恢復了向國際社會的外宣攻勢，積極準備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的會籍岌岌可危。在這樣詭譎的局面下，王世杰在1970年1月7日於日記中紀錄：「日昨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吳俊才來談，欲於今年年終，在臺舉行中國大陸問題討論會，邀約美國若干大學參加，並促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及中研院近史所為贊助團體，余頗躊躇。」（王世杰，2012: 1282）王世杰的躊躇，應與1967-1969年間國內人士對他與中研院對美學術合作交流的政治攻擊有關。王世杰

也許不願再涉入另外一個可能會帶來爭議的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計畫，而且王很清楚國研所真實的情治身分，他很可能不願再與這類機構來往交涉。此刻的郭廷以早已遠走美國夏威夷，開始自我放逐的異國人生，最終於 1975 年 9 月客死紐約。

綜言之，1967-1970 年間，中研院及其近史所的政治地位下降，院內學者不願亦不敢從事與當代中國大陸或是與中共政權有關的研究，但這又恰恰是美國漢學界領袖亟欲開拓——而且認為臺灣學者最能有所貢獻——的研究領域。受國府信任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在此時順勢而起，成為黨政機關、國內學者／情研人士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交流合作的唯一公開平台。在政治地位上扈從國民政府、在政治理念上與國府統治菁英維持相互主觀情誼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就因著這些制度與理念的條件，而權威地在國際政治網路中傳散特定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並藉此將中華民國建構為一具有國際相互主觀性質的想像體。而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政治地位與學術影響力也因此節節升高，並由國民政府獲得空前豐富的人力配置與財政物力資源：國研所在 1970 年遷入位於臺北木柵的全新四層辦公大樓，專任研究員與編制內行政人員規模成長超過一倍，且待遇優渥（除基本薪資外，研究人員撰寫每篇情研報告均有獎金，並配有多種生活福利與行政特許權）。不同的政治身分，會在冷戰時期臺灣知識權力關係的脈絡中導致極大的發展差異，這可由國際關係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制度發展路徑與知識內涵得到證實。

肆、共同的想像體： 島嶼的大國想像與國研所的關鍵角色

反思式建構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知識與現實的相互建構：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事實是相互照映的本體、相互構成彼此的內涵，而國際社會知識也無法自外於當時政治價值觀或意識型態的影響（Hamati-Ataya, 2013: 678-679）。準此，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概念架構的國關研究會將重點放在國際關係基本概念（作為一套權威的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事實兩者相互建構的機制與過程。國研所在冷戰高峰時期的功能擴張過程便強而有力地證成了

反思式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

前段提及，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共政府自 1949 年之後便開始了歷時數十年的中國國際代表權爭奪戰。從一開始，國民政府就處於相對不利的局面：國府既然失去了對大部分中國領土與資源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物理基礎；而臺灣無論在安全、經濟與社會發展各領域都極端仰賴美國的援助。但國民政府必須勉力維繫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因為國府宣稱統治全中國之正當性的根源在此；倘若沒有中華民國，那宣稱在國際間代表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其存在亦無國際意義可言。但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分，以及國民政府作為中華民國合法統治者與合法代表者的身分，必須藉由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集體承認方能取得。易言之，僅有國民政府主觀的認定是不足夠的，還需要其他國家（特別是重要國家）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主觀的承認，才能確立中華民國擁有主權國家的國際身分，以及國民政府為其國際代表的正當性。準此，主權身分的承認與國際代表權的授予，乃是一套被建構起來的國際社會事實。

進而言之，主權身分絕非單個國際行為者片面主觀意志下的產物，而是一個在國際社會成員之間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社會事實，並且未必與物理基礎相聯繫：擁有物理條件（對特定領土、人民、資源等物質條件的有效控制）的政治實體未必獲得國際社會接納為具有主權身分的獨立國家，而缺乏物理基礎的政治體也不必然就被國際社會除名。吾人可將這種缺乏物理條件、卻又取得國際正當身分權利的政體稱為「相互主觀的想像體」，因為這種政治實體的國際社會事實與其物理事實脫節，它的存在只限於國際社會行為者的集體主觀認定之中。因此，那些失去主權國家物理基礎的政治實體，需要投入極為可觀的政經與外交成本，以建構並維持此一國際社會事實，即確保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繼續承認其國家主權身分。這便是統治中華民國之國民政府在撤退至臺灣後所面臨的國際挑戰：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分（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間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國民政府必須盡全力建構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真實中國的國際相互主觀性。

國際冷戰的東西對抗格局使得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有成功的可能，雖然這樣的努力隨冷戰的延長與質變而日益昂貴。冷戰意識型態的對立，使得中

華人民共和國遭到國際社會西方陣營的排斥與孤立，而北京亦嚴格限制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導致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學者專家對中共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內部治理方針缺乏較直接、全面的瞭解，也使得他們積極尋求可信的中國情報與知識（克萊因，1990: 125-127；涂成吉，2007: 144-145）。中國的情報與知識恰是物質貧困、安全危殆的國民政府所能提供的少數重要資產之一，因其黨政軍系統轄下的情治機構不只典藏大量中共黨史資料，且在中國大陸維持情報網路，更有多位具有中共背景的資深調研人員，能夠針對中共內部的各方面發展提供極具洞察力的狀況分析與前景評估。事實上，國民政府自1960年代初期開始便以個案審查的方式，允許少數經過嚴格篩選（主要是那些同情國民政府立場）的西方中國事務專家或學者閱覽國府情治機構的中共黨史資料、中共內部現況情報與中國大陸情勢分析。

藉由向特定西方專家學者提供可靠的中共機密情報與權威的情報分析，國民政府便可主導西方中國研究社群的資料內容與詮釋方式，進而在西方國家培植並扶持同情國府立場的政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在中國知識匱乏的冷戰高峰年代，西方國家決策者無法深入中國大陸，也就無法在片斷的中國知識以外認識中國；他們所取得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便構築了在他們心智理解模式裡的中國，並據此制訂他們政府的中國政策。對西方國家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而言，中國知識建構了中國本體：中國知識不僅代表與解釋了那個客觀存在的中國本體，中國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更直接建構了西方國家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所認定為「真實」（authentic）之中國的屬性與內涵。藉由控制中國情報與知識的內容，國民政府認為即可控制國際社會西方陣營成員對中國的認知，確保西方陣營成員國之間相互主觀地承認中華民國為「真實的」中國（同時強化中共政府是一「非中國」政權的印象），進而影響這些國家的中國政策，以鞏固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相互主觀之想像體」的主權國家身分。隸屬國民政府國家安全局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便是在這樣的戰略與外交需求下，自1960年代中期踏上了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的征程。

雖然政研室在1953年成立時即負有為國府政策進行國際宣傳與情報交流的功能，但這項功能並非該室初期業務重點（國研檔案館，1953d）。從1953年到1960年，政策研究室將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投注於對中共優勢與弱點的

分析，以及對反攻中國大陸的長程戰略規劃，因此是國府內部的安全與外交政策諮詢單位。然而隨著國民政府被納入美國領銜的西方冷戰陣營（以1955年3月生效的臺美協防條約為分水嶺），以及中共政府不斷升高的外交挑戰，蔣氏父子便日益重視政策研究室的對外交流與宣傳功能，迭次敦促政策研究室要與政府以外的學術機構及專家學者有所聯繫，以維繫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身分與國民政府代表全中國的國際正當性。⁹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挺過了共黨在臺灣內部的顛覆行動與1958年金門炮戰的考驗，使臺灣的安全獲得鞏固。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卻面臨中蘇共關係自1960年的惡化，再加上中共政府冒進的三面紅旗政策而陷入饑荒與動盪，使得國民政府認定1960年代中期是反攻大陸的戰略機遇期（克萊因，1990: 75-104；彭大年編，2005: 15-16; 62-64; 475-476；國研檔案館，1966a）。臺北除了在軍事層面上積極準備（例如在1961年成立的「國光計畫」，以及1963年成立的「巨光計畫」等攻勢戰略計畫），也意識到對中國大陸的攻勢作戰必須獲得西方陣營的支持（或至少是諒解），因此需要加強對西方陣營成員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的溝通與遊說。¹⁰ 這也使得蔣中正與蔣經國自1960年代開始日益重視政研室的國際交流與宣傳業務（國研檔案館，1966a；張炎憲、許瑞浩，2009: 168-169; 246-252）。¹¹

但蔣經國對於政策研究室對外聯繫合作的成果並不滿意；他在1959年12月的研究室業務會報上表示，政研室應該以國研會的名義在香港與日本成立

9 蔣中正自1949年下半年開始即相當擔心中共軍隊在內戰的勝利與國府的內部混亂將會嚴重影響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身分，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蔣經國，1988: 147）。

10 事實上，國民政府在1960年代初期（1960-1962）即已多次要求美國政府支持（或至少祕密支持）國府對中國大陸的中小型軍事行動，因為1959年爆發的西藏反抗運動以及1962年的華南難民潮等事件，均使蔣中正總統認定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然到來。美國甘迺迪政府雖然在口頭上給予臺北極為模糊的政治承諾，但在內部評估中則完全不看好國府的軍事行動，並在實際作為上處處設限，使得蔣氏父子與國府外交人員在交涉過程中充滿挫折感，終至無成（涂成吉，2007: 194-243）。1960年代初期不愉快的協商經驗，可能促使蔣氏父子決定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擴大並加強與美國對華政策具影響力之政學界菁英的溝通與聯繫，以培養與運用同情國府立場的決策者與輿論領袖。

11 有關國民政府反攻中國大陸的軍事計畫，詳見《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彭大年編，2005）。

分支機構以蒐集中共情報，並與當地研究中共之專家學者建立工作關係。蔣經國也要求政策研究室在 1960 年結束前，應以國研會的名義出版權威性的公開刊物（國研檔案館，1959a; 1959b）。當政策研究室未能完成這些國際交流與宣傳任務時，蔣經國便直接改造政研室：他在 1961 年 2 月改國研會為「國際關係研究所」（以下簡稱「國研所」），並向教育部立案為一私立教育研究機構，使政策研究室正式地由一幕後敵情研析單位轉變成為一對外宣傳與交流機構（國研檔案館，1961）。

1961 年 10 月，《問題與研究》中文版終於照著蔣經國的要求，開始對外發行，而改制後的政策研究室也較為積極地以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名義舉辦國內學術座談會，接觸國際智庫與學術研究機構，與國外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交換機制，並於 1962 年 12 月開始發行對外公開的英文中共研究期刊，並在 1964 年 10 月將其正式命名為 *Issues & Studies*。到了 1964 年 4 月政策研究室成立十一週年的紀念會中，蔣經國已能自豪地說：「就是在這十一年之中，我們形成了一個反共理論的中心，也可以說是成了一個研究共產集團的資料供應中心。」（國研檔案館，1964a）縱然如此，蔣經國仍然繼續督促政策研究室擴大並改善其國際交流與宣傳的工作。他在 1964 年 8 月對該室核心成員表示：

「國家」必須求人了解。因為如果國家事不為他人所了解，便無法取得同情與幫助。……所以我們要在這方面下功夫。尤其是美國與我們的關係最為密切，自非求其了解不可。此外如歐洲國家及亞洲的重要國家，如日本，亦須設法使其了解。因為他們對我們多一分了解，就增加國家一分力量。國際關係研究所過去對內有很多貢獻，但今後應該向國際方面發展，這是我們的方向，並且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我們要做為一個資料供應的機構，替人家供應資料，這項工作，我們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國研檔案館，1964c）

綜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菁英是以政研室的知識菁英為一國際溝通管道與說服機制，藉由運用權威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作為一套特定的國際社會知識）

而建構並維繫一套相互主觀的國際社會事實，即中華民國雖然失去了絕大部分的物理中國，卻是一個「真實的」中國、「自由的」中國、與西方陣營反共政治意識型態相符合的中國，因此國際社會成員必須相互主觀地承認其具有主權國家身分，而統治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也因此具有在國際社會上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正當性（克萊因，1990: 105-117）。這是國民政府統治菁英與國研所知識菁英共享的一個大國想像。

蔣經國敢於要求政策研究室向國際社會積極進行宣傳攻勢，不是沒有原因的。1958年8月23日金門炮戰爆發，引燃第二次臺海危機；蔣經國有感於國府情治單位缺乏中共情報交換機制，遂於同年9月在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設立「匪情研究協調中心」，由該室主任擔任召集人，負責彙整國府各情治機構的中共情報及情研分析。政研室自此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共情報交換中心，負責將國府各情治機構所收集的中共情報加以彙整並分析，因而也就逐漸成為西方專家學者申請查閱國府中共檔案與情報的最主要溝通聯繫窗口（張炎憲、許瑞浩，2009: 168）。

彼時中國大陸尚未對外開放，西方國家想要了解中國內部的狀況，只有香港難民與臺北國府二途。而臺北在掌握中共高層鬥爭動態與政策發展方面，又更勝香港一籌，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第六組與其他國民政府情治單位（例如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均以中共為情報蒐集與分析的主要對象，自能較逃抵香港的大陸難民更為全面、宏觀地掌握中共政軍動態。這些壟斷性的情報資源莫說國際學者無法見到，就是普通的臺灣學者也無機會閱讀，只有國研所的研究人員才能使用。而且，國研所的一些資深中共問題專家本身即曾為中共人士（例如陳建中、任卓宣、馮達、鄭學稼、郭乾輝等），曾與中共領導人留學歐俄，或在紅色革命運動期間共處共事，因此國際上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也希望與這些國研所專家交好，聽取他們對中共高層鬥爭與政治決策的權威性判斷（國研檔案館，1968b）。易言之，在冷戰的高峰期，國研所開始運用壟斷性的中國情報與洞見作為建構國際中國研究議程的工具，希望將知識建構為事實，以維繫中華民國作為國際想像體的相互主觀性。冷戰高峰期的中華民國在很大程度上據有中國研究的國際發言權與知識制高權，這與她當時的物質條件呈現極大的反差。

國研所與國民政府其他情治機構所收藏的中共情報與檔案，對研究中國的國際學者極具吸引力（張朋園，1995: 97-98）。當時美國漢學研究的領袖如費正清、Martin Wilbur、A. Doak Barnett、John Lindbeck 等都希望運用國民政府典藏的中共檔案與中共情報，以便更準確地掌握中國內部的各項發展，並與臺灣及其他東亞國家做比較研究（張朋園，1997: 41-49; 74-79）。但是直到 1960 年代初期，臺美之間仍然只有零星、個別的學者向國研所申請查閱中共史料或中共情報，制度化的中國情報交流仍未展開。而且，供應中國情報與知識的政治目的既是在於建構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真實、自由」之中國想像體的國際相互主觀性，則供應的對象就必須經過嚴格篩選：凡是對此政治目的沒有幫助的學者或機構，便不在國研所合作交流的名單上。美國漢學家在 1960 年代已數次嘗試與國民政府溝通，希望閱覽或複製中共檔案，但國府的情治機構多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加以婉拒。¹²

即便受到多次挫敗，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仍然鍥而不捨地尋求與臺灣學術機構合作研究中國大陸與中共政府，合作的範圍也不僅限於檔案研究，還包括中共現況分析。面對美方學者迭次探詢合作意願，臺灣學者——尤其是中央研究院的中國研究學者——不敢亦不願參與其事，但又不能明言拒絕，因為合作研究計畫將帶來財政援助與出國深造機會，而且如前述，中國研究是美國少數需要臺灣協助的領域，也是臺灣能對冷戰盟國做出的極少數貢獻之處（國研檔案館，1968b）。就在同時，國家安全局政研室以國研所的面貌出現於臺美學術合作交流的領域中。接掌政研室主任不及兩年的印度史學者吳俊才，開始頻繁地參與臺美社會科學交流活動，並積極地在國際中國研究

12 例如在 1962 年，政治立場保守且與國府關係良好的美國胡佛研究所表達希望與政研室（即國研所）建立中國資料交換制度，但申請案遭到國家安全局否決，因為根據該局在美情報顯示，胡佛研究所與北京圖書館有正式交換資料關係。國家安全局局長陳大慶且要求政研室「今後凡具有機密性之刊物及參考資料，均即停止交換為荷」，此案遂胎死腹中（國研檔案館，1962）。又如 1964 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共同提出的「中美互換近代史研究資料計畫」，該計畫希望查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與調查局典藏的中國近代史檔案，範圍涵蓋 1901 年至 1945 年。國安局在 1964 年 3 月原則同意調查局選擇性地向該計畫開放中共黨史資料，然而調查局立即表示該案應予婉拒，因為「本局資料室歷年收藏各類匪情資料，頗多為情報檔案資料，此後交換資料之選擇及原始資料之翻印等，均與鈞局過去指示及本局資料借閱使用規定不合」，此案遂再以失敗告終（國研檔案館，1964b）。

學者面前，將當時仍不具國際知名度的國研所塑造為一具有權威形象的中國大陸與中共資料供應中心。

1965年9月10日，由中央研究院主導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美合作會）設計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美國漢學界領袖人物、亞洲經濟發展學者 George Taylor 提議由臺美學者共同研究中共經濟政策與相關議題，美方學者認為這是該次會議最重要的議案。但中研院學者均認為研究中國大陸議題是政治上的禁忌，因此根本無法研究。中美合作會臺方成員全漢昇（中研院院士）便認為此案過於困難，他列舉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問題：「研究所需進口有關中共之出版品，卻為治安人員所禁止。」（國史館，1965）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世杰在1966年亦曾提到，他有意組織臺美機構，聯合研究中共政治經濟問題，但「不敢」（王世杰，2012: 1107）。這顯示即便是享譽國際的中研院院長與院士也不敢碰觸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研究議題。但是不願放棄的美方學者，在中美合作會於1966年4月於紐約召開的預備會議上，進一步建議臺美學者以社會科學的治學方法聯合研究當前中國大陸的各方面發展。但是中研院的學者們仍覺為難，因為中國大陸與中共政權是極為敏感的研究對象，不只普通大專院校沒有這方面的學者與課程，就連中研院本身也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那些黨政關係良好的情治機構具備研究中與中國大陸的人力與資料。

中美合作會設計小組的臺灣委員於1966年5月18日開會討論時，邢慕寰（中研院院士）就在會中明確表示：「對 Mainland China 之研究需謹慎，美方固有誠意，我們為顧及政治背景只可供給資料，至於（還牽涉到學人之）責任問題，亦應慎於辦理。」（國史館，1966a）作為中美合作會臺方主席的中研院院長王世杰也在中研院內部會議中表示，有關與美方聯合研究中國大陸的建議，在「其方法，方式，範圍，機構應慎於討論」。而同樣作為合作委員會臺方成員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更發言指出「至於研究大陸問題，我方之處境即可做些什麼，亦應向美方坦白說明」。這顯示中研院人文與社科學者們夾在美方的研究要求與國內政治壓力之間的尷尬處境，既不能得罪美方，又不能逾越國內情治機構的政治紅線（國史館，1966b）。因此，以中研院文史社科學者為骨幹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自1966年成立之後，便將

臺美社科合作重點放在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與訓練臺灣的經濟研究人才。至於當代中國大陸與中共研究，則幾乎沒有學者願意（亦是不敢）與美方合作。但這又是美方學者亟欲開拓的領域，中美合作會只能委託國際關係研究所進行與中國大陸及中共有關之資料的複製、參考資料的編纂，以及籌辦中國大陸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69）。¹³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美合作會）於1966年6月17-19日在臺北召開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其中有一場關於中國大陸研究現況的分組討論，其重點完全在於國研所是否有專業能力經辦臺美中國大陸研究的合作交流事宜，以及國研所能夠對美方學者提供哪些與中國大陸研究有關的資料。至於國內其他學術機構，則完全沒有討論。這顯示當時國內其他學術機構既無能力、也不敢從事中共研究，更不用說與國際學者分享中共研究的資料，僅能以國研所為臺美合作交流的平台，而無其他選項。美方中國研究學者對國民政府嚴格限制臺灣的當代中國／中共研究感到失望，但是對國研所則抱以期待。根據這個分組討論的結果，1966年會議聯合聲明中的最後一項便表示臺美中國大陸研究的首要工作在於擴大雙邊合作機制的建立，而且首先應該建立中國大陸相關資料與檔案的交換制度及共同研究項目的推動（Archiv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66）。

在通過中美合作會的肯定之後，政研室主任吳俊才在1966年6月30日致信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當時兼任中美合作會中方主席），希望王世杰支持國研所向中美合作會申請製作縮影膠捲設備與出版中共資料的經費補助。吳俊才顯然獲得王世杰某種程度的支持，因此在1966年7月正式以國研所的名義，向行政院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簡稱長科會，即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科技部的前身）與中美合作會提出補助該所添購檔案微縮設備與資料編譯費用的申請案（國史館，1966d）。吳俊才之所以要向長科會與中美合作會申請補助，原因即在於要將政研室的中共情報與情研報告先編纂目錄，之後翻攝成微縮膠卷，以方便國內外專家學者查閱使用，也避免因為其他情治機

13 情治單位對中研院的學術研究影響極大，以致於王世杰必須在1966年6月11日致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陳建中（為蔣經國極為信賴的情治首長），表示將發送「匪情」資料給中美人社會議出席人員，並附送人員名冊給陳過目（國史館，1966c）。

構拒絕國際合作而產生負面的國際影響。而且，國研所的申請案能為中美合作會的尷尬處境解套：由獲得層峰信賴、且源出情治系統的國研所擔綱負責敏感的「匪情」研究合作與交流，既可對美方有所交代，又能免去不必要的政治風險。為了考察國研所的專業學術能力，王世杰在 1966 年 9 月 29 日參訪該所（王世杰，2012: 1122; 1136），而吳俊才隨即於 1966 年 10 月 1 日召集中美合作會臺方委員與國研所各組召集人開會，確定向該委員會申請補助款項的金額與使用方式（國研檔案館，1966b）。

1966 年 10 月 26 日，中美合作會正式向行政院長科會建議補助國研所新臺幣四十萬，但表示此案「不擬由本會直接處理」，為的是在行政與政治上與國研所進行切割，同時又滿足美國漢學界的要求（國史館，1966e）。國研所隨即在 1966 年 11 月成立合作交流組與資料交換中心，並開始將長科會與中美合作會的補助使用在編譯中英文的《中共人名錄》。該書收集中共重要政軍人物的傳記資料，自 1967 年開始編輯，期間受到文化大革命頻繁更替中共領導人士的影響，直到 1969 年始出版，爾後不斷更新再版。《中共人名錄》是冷戰時代第一本以可信的中共情報與情報研析為內容、且對全世界公開發行的中共菁英政治參考書，有二十年之久是全世界中國研究學者與中國／東亞研究中心必備的標準工具書。至此，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機構發展方向與其代表作的性質已完全不同於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國研所獲得國民黨政府的全力協助，所出版的《中共人名錄》緊扣當時中共政治發展的脈動，對中共當權人物提供權威的背景資訊。而近史所由美國漢學界獲得補助，於 1967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將典藏於臺灣清季民初中國政府的外交檔案進行了詳盡的建檔與編纂，但是對當下的中國政治則完全不提。

《中共人名錄》的出版奠定了國研所在國際中國研究及共黨研究社群中的權威地位。自 1960 年代晚期開始，西方國家的中國研究機構負責人與青壯輩中國研究專家學者開始絡繹不絕地訪問國研所，在當時位於臺北市忠孝西路中央日報大樓的所本部查閱中共檔案，並與所內中共研究專家交流。¹⁴

14 例如，已逝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中國政治學者 Richard Baum，便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他在 1967 年於國研所閱讀中共機密文件的經驗（Baum, 2010: 21-28）。

然而國研所並不滿足於僅只是被動地提供中共情報與知識給國際學者。吳俊才還希望能由臺灣召開國際級的中國大陸議題研討會，邀請對國民政府持同情立場的著名國際中國研究學者與會，並在會議期間安排參訪國民政府各項政軍經建設，且主動提供更為機密的中共情報與情研報告，使得這些獲國府支持的學者因為得到第一手的特供資料，而得以在各國學術與輿論競爭中勝過那些對中共政府持同情立場的學者，進而爭取更多學者支持國民政府，最終改變各國對華政策的方向。在取得中美合作會補助案之後，吳俊才於1966年12月6日致信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保守派亞洲研究領袖 Richard J. Walker 教授。他在信中表示中美合作會已成立中國大陸研究組，由他擔任召集人，而且中美合作會更決定推動在1967年9月召開臺美中國大陸研究的雙邊研討會，請 Walker 教授建議會議討論主題，並推薦美國方面的學者人選（國研檔案館，1966c）。

吳俊才所言確有所本，因為美國的保守派中國研究學者已多次向中美合作會表達希望召開以中國大陸內部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以便與國研所中共研究者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國研檔案館，1966a; 1967b; 1969）。吳俊才已在1966年9月向蔣經國表示有籌開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需要，而他提出的舉辦會議的理由及方式，都表達出當時國府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將權威的中國情報與知識當作工具，用以維持中華民國作為一具有主權國家身分之國際想像體的相互主觀性。吳俊才首先向蔣經國表示國際間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專家學者，對臺灣的研究成果已逐漸重視，而美德韓等各國學者來臺訪問時，都建議在臺召開中國大陸問題的國際會議；且中共政府因為文化大革命導致情勢混亂，其未來走向是各國政府與研究者極為關心的議題，這對國民政府極為有利，所以召開此一國際會議的時機已經成熟。

其次吳俊才表示該會議的目的有四：(1)增進彼此了解；(2)由臺灣學者提出權威性論文或報告，使國際學者重視我方觀點；(3)提供正確權威的中共資料，以「影響國際學者」；以及(4)使國際學者了解「自由中國」的進步情形，爭取國際認同。吳俊才義不容辭地提議由政研室以國研所的名義出面召開會議，因為「黨政及情報機構出面不便，學者卻步，故擬由本所出面邀請」。但是，既然要提供國際學者更為機敏的中共資料，吳俊才建議所有匪情研究協

調中心的機構成員都必須是協辦單位（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第六組、國防部情報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參謀本部情參室，以及國家安全局第四處）。各情治單位都被要求提供整套有真正價值的中共情資，用影印或微縮膠卷複製，贈送與會學者，以「影響其對匪認識」。吳俊才且將邀請對象分為三大類：(1)對國民政府同情及瞭解者；(2)中立者；(3)對國民政府不友好者。第三類學者，吳俊才建議只邀一二人即可，而要將重點放在第二類學者（國研檔案館，1966a）。

這個具有戰略性質的攻勢宣傳計畫，獲得國家安全局的支持，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也對其提議與方向極表贊同。蔣經國在 1966 年 11 月指示政研室，中國大陸問題國際會議，不必和中央研究院合作，由國研所舉辦即可，而各情治機構必須鼎力相助。蔣經國又特別提醒：「外國學人中明知其為匪張目、對我有偏見者，不必邀請。」（國研檔案館，1966d）政研室籌開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提議，也獲得蔣中正外交幕僚的直接支持：1967 年 1 月 20 日，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外宣專案調查小組聯名決議，要全力扶持國研所，增加其經費與設備，「使成為對國內外供應匪情資料與研究大陸問題之代表性機構」，並要求其他單位應全力支持國研所舉辦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67a）。爾後幾經波折，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SACMC）終於在 1970 年 12 月 13-19 日於臺北實踐堂召開，28 位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受邀發表論文，其政治主張一如吳俊才四年前的規劃，涵蓋了同情國府與持中立立場者，至於那些被國民政府認定為同情中共政府者（例如費正清），則無一人受邀。

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簡稱中美會）的召開，是國研所制度發展與功能擴張的里程碑。中美會的成功，使得國研所的預算與人員持續增加：國研所專任研究員與編制內行政人員的總數，由 1960 年代晚期的 80 人左右，躍升至 1970 年代中期的 180 人。而國研所主辦中美會的年均預算，在 1970 年代竟達新臺幣 1,475 萬元（以 2012 年幣值計算）。¹⁵ 國研所更以中美會為藍本，

15 中美會每年的預算金額是筆者由國研所會計組歷年檔案中得出，再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自 1971 年起舉辦中日當代中國研討會，以及後續其他的雙邊會議（例如華歐會、首爾論壇等）。而中美會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一直是北美中國研究學者亟欲爭取參加的年度學術盛會。¹⁶ 中美會是臺灣中國大陸研究開始走向學術化的起點，也是臺美社會科學社群制度性合作下的產物，是 1960 年代開始在臺美雙邊輪流舉辦之各項社科商管學術會議——例如臺灣經濟會議、臺灣人才會議——的自然延伸。臺美學者在會議中各取所需：美國學者得到外界無法取得的中共情報與知識，而臺灣學者則發現並開始將新一代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用至中國大陸研究領域。

但是，中美會能夠成功舉辦，其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希望將特定的中國知識轉而建構為國際社會事實，即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更「真實」、「自由」之中國想像體的國際相互主觀性，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正當性。易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認為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分與國民政府在國際間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將會因為這些精心設計的學術交流活動而獲得改善，國外學者將可能在參與這些會議後，改變對中共的看法，進而採取較為反共的意識型態立場，至終影響他們國家的官員與議員，並間接地鞏固中華民國在冷戰中的戰略價值。可以說，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策畫、到 1970 年代大規模執行的國研所學術外交活動，是國民政府企圖扭轉外交挫敗的戰略性宣傳攻勢，以學術活動為憑藉。

然而國府統治者藉由國研所執行的戰略性外宣攻勢至終仍未達成其預設的政治目的。更為精確地說，國府的政治與知識菁英終究無法將他們所建構的中國知識轉化為具有相互主觀地位的國際社會事實。國府統治菁英所投射的中國論述，從未達到霸權知識體系的地位，遑論將這套中國論述鞏固為國際社會事實。國研所在國際社會提倡並傳散的中國知識，總是與異質性及敵對性甚強的另類中國論述體系進行較量。當國府統治者與知識菁英樂觀地預

衡平後得出每年預算金額在 2012 年的幣值。相比之下，2012 年臺美會（即冷戰時期中美會的延續）僅編列新臺幣 96 萬元的預算。

16 筆者在國研中心檔案室中發現十數封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致國研所（及爾後的國研中心）主任的信函，信中主動表達希望參加來年中美會的意願，時間涵蓋 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中期，足證中美會在當時受到北美學者重視的程度。

期他們發展的外宣攻勢能有效地鞏固中華民國與其國民政府的生存與國際正當性，他們所努力建構的中國論述早已在國際社會面臨強大的挑戰與抵抗。中共政府已從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中回神，重新專注於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外交陣地戰。同一時間美國政府仍深陷越戰，而中南半島的戰事不只耗費可觀的國力，更使得華盛頓在外交與戰略態勢上顯得被動。而且，受到激進社會文化運動氛圍影響的西方社會知識菁英，又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有著好奇心、甚至給予正面的評價，並且轉而批判專制獨裁、人權紀錄不佳的中華民國政府。這些物質與理念條件彼此交融，相互加乘，使得越來越多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與國關外交專家改變看法，認定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的中國」，而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國際社會無法忽視的重要行為者。即便是那些不認同共產主義理念的西方政治與知識菁英，也都難以否認與中共政府交往可能帶來的政治、外交與戰略價值。

西方社會對中國看法的改變，在季辛吉與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加入聯合國，以及加拿大與日本同北京建交等重大發展之後，已再難逆轉，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向。國府統治者與其知識菁英所建構之中國知識的核心內涵與其論述目標（即維護中華民國的國際相互主體性與國際正當性），在 1970 年代初期之後便在國際輿論場域節節敗退，就算是與西方保守派學者合作也難挽頹勢，因為連他們也都成了各自社會內部的少數派。這樣的發展呼應了筆者對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理論的批評：國際社會事實上幾乎從未被單一的知識霸權體系所壟斷，而總是存在著多個性質各異、或是立場相左的知識體系。另類的社會知識並不會從國際場域中徹底消失，即使是取得霸權知識體系地位的知識與權力聯盟也難以完全斬除那些異質性的、或帶有抵抗性質的另類論述。而且一套社會知識的鞏固程度會因觀察的層級改變而有所不同：在本案例中，國府統治者與其知識菁英所建構的中國論述，在 1970 年代的臺灣已達到了霸權知識體系的地位，但在全球層級而言卻已淪為邊緣、非主流，甚至是悖離時代潮流的看法。

國府統治者藉由國研所建構並傳散的中國論述之所以失敗，可能也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成員的警覺與反制有關，值得吾人持續探究。國研所在冷戰時期所傳散的中國論述，必須經過國民黨統治菁英的審查與核可，然而不是

每個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都接納這套中國論述與其核心內涵。那些政治主張與國府統治者相左、或是對國民黨政府持批判態度的中國研究學者（例如費正清與孔傑榮），不只難以獲得國府提供的中共或中國大陸資料，他們可能也懷疑國府所供之資料的可信度。而且，這也特別涉及美國漢學界內部的深層分歧：政治上保守反共的中國研究學者（以華盛頓大學、聖若望大學、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與胡佛研究所為中心）較為同情國民黨政府，這些學者便與國研所密切合作，也較容易取得中國資訊；而自由派的學者（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中心）則較為嚴厲地批評國民黨政府，並支持與中共政府進行接觸與交流。為了讓兩派的學者都能取得可信的中國資料，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於 1963 年同意出資於香港成立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以協助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在香港進行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大學服務中心因此成為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競爭者，而國府也就不再是唯一的中共資料提供者（Vogel, 2004: 1-3）。等到中共政府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允許西方漢學家進入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國際中國研究社群所能取得的中國資訊來源便更加多元，也更加直接，而國研所作為中國資訊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就更加下跌，到了 1980 年代更是一去不復返。作為一個宣稱有資格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想像體，中華民國終究失去了相互主觀的國際地位，而這樣的主張也就更加與現實脫節。國府最後的外宣攻勢，也不得不在 1979 年美中建交後劃下悲壯的句點。

伍、結論：中國學、冷戰史與臺灣的國際社會知識

針對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冷戰時期的國際角色與其制度發展歷程，本文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研究取向，並以 1960 年代臺美雙邊中國研究社群建立制度性合作交流的協商談判過程為例，試圖提供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詮釋。本文根據反思論雙層詮釋模式，在兩個現象詮釋的層次上剖析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歷程：第一個詮釋層次探究國研所建構國際社會事實的制度與理念條件，第二個詮釋層次則探討國研所將特定國際社會知識建構為國際社會現實的過程。在第一個詮釋層次之下，本文解析國研所得以將中華民國

國建構為具相互主觀性質之國際想像體的國內條件，即冷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專制政治下不對稱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並且比較國研所與中研院兩機構在此關係網路中的相對位置。國研所的中國知識菁英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分享了一致的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保守的政治理念，又在政治關係上積極地扈從、靠攏國府統治者，因此獲得蔣氏父子的政治信任，擁有權威的學術影響力與豐沛的物質資源。而中研院學者雖然與國府統治菁英分享中國國族意識型態，卻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揚鑣，復在政治關係上與國府統治菁英及其情治幕僚保持距離，因此不只難以獲得蔣氏父子的政治信任，甚且在 1960 年代中期之後開始不由自主地捲入一波波的政治風暴，使得蔣經國下令排除中研院學術領袖參與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設計過程，因為他們已被認定無助於國府的戰略性外宣攻勢。

本文在第二個詮釋層次之下，則適切地回答了現有研究國研所制度發展之文獻無法回答的問題：首先，國研所主任吳俊才之所以在 1966 年 9 月向蔣經國提出與中研院共同舉辦國際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建議，乃是因為他參與了以中央研究院學者為骨幹的臺美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合作交流機制（即「中美人文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但中研院中國研究學者懼於國府的政治限制與壓力，不敢與美方學者合作研究中國大陸情勢與中共政治，因而有吳俊才提議由國研所主辦該研討會的建議。其次，國研所在吳俊才主持期間，由一內部情研分析智庫轉型為一公開的國際學術合作與對外宣傳單位，實肇因於國民政府意欲將中華民國建構為一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國際想像體：國府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便將國研所改造為一國際說服機制，以國研所為管道，將別處皆不可得的中共情報與知識提供給同情國民政府立場的國際專家學者，藉此證明中華民國為「真實且自由」的中國、是與冷戰西方陣營反共意識型態相符合的中國，進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對華政策，確保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分，以及國民政府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國際正當性。

而這些發生在冷戰時期的人與事，對當下臺灣的中國研究知識社群有何意義？吾人將會發現冷戰格局與威權政體雙元結構在臺灣所形塑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不只決定了個別知識菁英與學術機構的榮辱升黜（即在權力地圖上的相對位置），也深刻地影響了往後臺灣中國研究的發展路徑與研究重點。

易言之，社會知識建構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也會反饋到社會知識的內涵之中，即便原初的知識權力關係格局已經不復存在，制度化的社會知識也仍然存留，只是必須與後起的社會知識同台競爭。國際關係研究所是臺灣中國研究主流社群的源頭，而國研所資深中國觀察者在冷戰時代的相對優勢——對中共政治菁英的人格與其社會背景的分析，以及對中共派系鬥爭與高層政治人事更迭的關注與解釋——則在「匪情研究」學術化的過程中被保留下來，成為臺灣下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的必修課程。這多少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冷戰過後、已經民主化的臺灣，其中國研究學者仍舊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為關注中共黨史、中共意識型態變化，以及中共政治菁英選任過程等特定研究議題。可以說，冷戰時期臺灣的知識權力關係仍然明顯地建構了現今吾人所強調的具有「臺灣特色」的中國研究範式。¹⁷

以國研中心歷史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問題與所做觀察，對當下臺灣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有三重意涵。第一，這樣的研究將有助於推動臺灣冷戰國際史研究社群的茁壯。冷戰結束已超過二十五年，當年的政治限制已解除，全球的當代史學界、國際史學界與國關學者紛紛投入冷戰的研究，以釐清在那四十多年間發生的諸多對後代影響深遠的事件與制度。Melvyn P. Leffler 與 Odd A. Westad 於 2010 年編輯出版的三冊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則是由數十位史學家、國關史學者與國關理論學者所貢獻的當代冷戰研究精華。著名的冷戰史學者或研究團隊，皆因掌握各自政府的檔案而得以對冷戰史進行實證研究與理論創新，並且形塑了全球冷戰史研究社群的基本框架。最重要的是，各國主要的冷戰史研究計畫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研究重心置於那些曾經影響該國政經發展的重要冷戰人物、事件、理念或制度。易言之，各國冷戰史學者感興趣、並致力研究的重點是冷戰曾經如何深刻地建構了他們的國家與社會，以及這些國家又是如何影響了冷戰的興衰。這些學者的本土關懷（有時也因為政治菁英所加諸的限制或強勢主導，例如中國的冷戰史學者們）使得他們能夠在一開始就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踏入冷戰史研究

17 例如寇健文、蔡文軒、鍾延麟等與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關係深厚之學者，都可被視為頗具「臺灣特色」之中國研究範式的代表性人物。

的領域中，並發展出具在地特性、卻又帶有普適貢獻的研究成果。

然而，《劍橋冷戰史》卻沒有給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足夠的描述，其中關於冷戰在東亞以及中蘇分裂的專章僅將臺灣視為大國競逐下的一個可有可無、邊緣的議題。而且，《劍橋冷戰史》也沒有臺灣（或臺灣出身）的學者參與撰寫；書中有關東亞與中國的專章是由中國大陸學者完成的，而他們將研究的重點置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並不意外。以臺灣的史料為基礎，發展具臺灣主體論點的國際冷戰史研究，實在是刻不容緩。本文在反思式建構主義的詮釋架構下，運用了本土的歷史檔案以呈現並詮釋冷戰時期國研所的發展軌跡，可視為臺灣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第一步。本文雖以臺灣為出發點，卻也需要在下一個研究階段參照其他國家相關的歷史檔案並積極與國際冷戰史社群進行交流，以發展出更為全面、觸及更多層次、能夠提供更滿意之解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而本文所運用的微觀式研究途徑，也需要其他研究方法的配合與平衡。準此，本論文可視為是一個牽涉層面更廣泛之跨學科冷戰國際史研究計畫的先聲。

第二，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詮釋框架的中國／國關研究，可以與現今臺灣政治學社群裡的「中國學」進行對話與相互學習。「中國學」研究全球著名中國研究學者之學說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其方法論，並將中國研究學者的學術成果與他們的思想及人生歷程加以對照、聯繫，進而勾勒出世界不同區域的學者對中國之想像的異與同。¹⁸ 中國學與反思式建構主義都以知識菁英的思想脈絡及其文本內容為研究的對象，都企圖觀察並詮釋特定知識的建構過程，但中國學停留在剖析個別中國研究學者的學思歷程與他們對中國內涵的主觀認識，而反思式建構主義更鼓勵研究者可進一步探究(1)特定的中國知識是否被建構為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國際社會知識，(2)與中國有關的國際社會知識是否繼續被建構為國際社會事實，還有(3)與中國相關之社會知識被建構起來的物質與理念條件。易言之，反思式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不只研究思想與其變遷過程，亦十分重視思想的政治條件與政治效應。準此，反思式建構

18 有關臺灣中國學社群的發展及其研究成果，請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思想與中國」研究所學程網站，<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4.php> 及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3.php>。

主義能夠將「政治」帶回臺灣的中國研究討論脈絡之中，並將「思想」重新擺回知識與權力關係之中，進而呈現具有時空脈絡性的理念建構過程。

第三，本文可發揮拋磚引玉的功用，促使臺灣——乃至於其他華人社會——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學者開始將臺灣當代的知識與權力關係加以問題化與去熟悉化，使得中國研究／國關研究知識菁英與政治菁英的互動條件、機制與模式成爲學術研究的題材。畢竟，反思式建構主義的核心項目即是探索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事實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及剖析這個相互建構過程的制度與理念條件。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王世杰

2012 《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Wang, Shih-chieh, 2012, *The Diary of Dr. Wang Shih-chieh*.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王 萍（訪問）、官曼莉（紀錄）

1990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Wang, Ping (interview) and Man-li Kuan (record), 1990,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Han Lih-wu*.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佚名

1992a 〈政要養成所（上）——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祕面紗〉，《中外雜誌》52(4): 112-115。(Anonymous Author, 1992a, "A Training Ground for Government Dignitaries in Taiwan (I): Unveiling the Mysteriou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aleidoscope* 52(4): 112-115.)

1992b 〈政要養成所（下）——揭開「國關中心」的神祕面紗〉，《中外雜誌》52(5): 131-133。(Anonymous Author, 1992b, "A Training Ground for Government Dignitaries in Taiwan (II): Unveiling the Mysteriou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aleidoscope* 52(5): 131-133.)

克萊因

1990 《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臺北：聯經。(Cline, Ray S., 1990,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United Daily News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er (tran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李甲孚

1994 〈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新傳之八〉，《中外雜誌》56(2): 124-128。(Lee, Chia-fu, 1994, "A New Biography of Chiang Ching-kuo, Part 8," *Kaleidoscope* 56(2): 124-128.)

沈懷玉（訪問）、周維朋（紀錄）

- 2004 〈李恩涵先生訪問紀錄〉，見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 213-23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Shen, Huai-yu (interview) and Wei-peng Chou (record), 2004,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Lee En-han," pp. 213-234 in Yi-shen Chen et al. (interview) and Jing-ling Wang et al. (record),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Kuo Ting-ye by His Disciples and Friends*.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沈懷玉（訪問）、簡佳慧（紀錄）

- 2004 〈王萍女士訪問紀錄〉，見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 113-13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Shen, Huai-yu (interview) and Chia-hui Chien (record), 2004, "The Reminiscences of Ms. Wang Ping," pp. 113-132 in Yi-shen Chen et al. (interview) and Jing-ling Wang et al. (record),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Kuo Ting-ye by His Disciples and Friends*.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邵玉銘

- 2013 《此生不渝：我的台灣、美國、大陸歲月》。臺北：聯經。(Shaw, Yu-ming, 2013, *Autobiography of Shaw Yu-ming*.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涂成吉

- 2007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Tu, Cheng-chi, 2007, *Ray S. Cline and His Taiwan: The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of His Passion and Reason on Anti-Communism*.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國史館

- 1949 〈蔣經國致蔣中正書信（1949年6月29日）〉，《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 0021601000 0253029。(Academia Historica, 1949, "Letter from Chiang Ching-kuo to Chiang Kai-shek (June 29, 1949)," *Collection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File Number 0021601000025 3029.)
- 1965 〈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設計小組第二次會議記錄（1965年9月10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5, "Transcripts of 2nd Meeting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of Sino-American Science Cooperation (September 10, 1965),"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1966a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公文（1966年5月18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6a,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18, 1966),"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1966b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公文（1966年5月22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6b,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2, 1966),"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1966c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公文（1966年6月11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 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6c,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ne 11, 1966),”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1966d 〈徐可燦手稿 (1966 年 7 月 11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6d, “Handwritings of Hsu Ke-biao (July 11, 1966),”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1966e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公文 (1966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檔案卷宗編號 041-000-000-248A。(Academia Historica, 1966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ctober 26, 1966),” *Archives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File Number 041-000-000-248A.)
- 國研檔案館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檔案館)
- 1953a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公文 (1953 年 2 月 17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Archiv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53a,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ebruary 17, 1953),”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3b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公文 (1953 年 2 月 19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3b,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ebruary 19, 1953),”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3c 〈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公文 (1953 年 3 月 16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3c,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f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March 16, 1953),”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3d 〈蔣經國在研究會報的指示 (1953 年 7 月 13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3d, “Chiang Ching-kuo’s Instructions to IIR Research Work (July 13, 1953),”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3e 〈蔣中正總統對國際關係研究會同人的指示 (1953 年 9 月 19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3e,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s to IIR Staffs (September 19, 1953),”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7a 〈國際關係研究會公文 (1957 年 7 月 5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7a,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July 5, 1957),”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7b 〈國際關係研究會公文 (1957 年 10 月 30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7b,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ctober 30, 1957),”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9a 〈蔣經國在研究室業務會報的指示 (1959 年 12 月 25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9a, “Chiang Ching-kuo’s Instructions to IIR (December 25, 1959),”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59b 〈國際關係研究會公文 (1959 年 12 月 28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59b,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December 28, 1959),”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1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1 年 2 月 27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1,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February 27, 1961),”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2 〈國家安全局局長公文 (1962 年 12 月 29 日)〉，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2,

-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from the Director-General of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December 29, 1962),”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4a 〈蔣經國在研究室周年紀念會中的指示 (1964年4月1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4a, “Chiang Ching-kuo’s Instructions to IIR (April 1, 1964),”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4b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致國家安全局公文 (1964年4月6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4b,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from Investig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to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April 6, 1964),”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4c 〈蔣經國在招待茶會中對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的指示 (1964年8月14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4c, “Chiang Ching-kuo’s Instructions to IIR Research Staffs (August 14, 1964),”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4d 〈國際關係研究所業務簡報資料 (1964年9月18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4d, “Briefing Materials of IIR (September 18, 1964),”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6a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6年9月20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6a,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September 20, 1966),”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6b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6年10月1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6b,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October 1, 1966),”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6c 〈吳俊才信函 (1966年12月6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6c, “Correspondence of Wu Chen-tsai (December 6, 1966),”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6d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6年12月9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6d,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December 9, 1966),”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7a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7年1月25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7a,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January 25, 1967),”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7b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7年7月1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7b,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July 1, 1967),”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8a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8年6月7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8a,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June 7, 1968),”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8b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8年11月25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8b,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November 25, 1968),”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 1969 〈國際關係研究所公文 (1969年7月3日)〉, 檔號不詳。(IIR Archives, 1969, “II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July 3, 1969),” File Number Unavailable.)

張朋園

- 1995 〈回想量字師〉, 見陳三井 (主編), 《走過憂患的歲月: 近史所的故事》, 頁 89-110。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Chang, Peng-yuan, 1995, “In Remembrance of My Mentor Mr. Kuo Ting-yee,” pp. 89-110 in San-ching Chen (ed.), *Walking Through the Years of the Storms: The 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1997 《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 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Chang, Peng-yuan, 1997,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Kuo Ting-yee, John K. Fairbank, and C. Martin Wilbur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aiwan-U.S. Academic Exchange*.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張炎憲、許瑞浩

- 2009 《從左到右六十年: 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 國史館。(Chang, Yan-hsien and Rui-

hao Hsu, 2009, *From Left to Right: The Reminiscences of Yung-hsien Tseng's Political Conversion, 1940s-2000s*.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張淑雅

2011 《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Chang, Shu-ya, 2011, *Did the Korean War Save Taiwan? Interpreting U.S. Taiwan Policy*. Taipei: Acropolis.)

張實

1990 〈它們都是國府的智庫：透視國府總統李登輝的四大幕僚機構〉，《時報周刊》279: 26-27。(Chang, Shi, 1990, "They Ar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Think Tanks: President Lee Tenh-hui's Four Major Advisory Institutes," *China Times Weekly* 279: 26-27.)

郭廷以

2012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Kuo, Ting-ye, 2012, *Diary Fragments of Kuo Ting-ye*.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陳煥然

1990 〈「國關中心」預算最大資訊最豐〉，《時報周刊》279: 27-28。(Chen, Huan-ran, 1990,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Granted the Largest Share of Budget and Boasts the Riche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China Times Weekly* 279: 27-28.)

彭大年(編)

2005 《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ong, Da-nian (ed.), 2005, *Kuoguang War Plan: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Taipei: Military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Offi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曾熾卿

1994 〈是「升官樂園」也是「招安總部」——千奇百怪的國關中心〉，《財訊》145: 108-110。(Tseng, Yan-ching, 1994, "It Is a Paradise of Promotion and a Locus of Pleasure: The Peculia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alth Magazine* 145: 108-110.)

黃克武(訪問)、周維朋(紀錄)

2004 〈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見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249-27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Huang, Ko-wu (interview) and Wei-peng Chou (record), 2004,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Chang Peng-yuan," pp. 249-278 in Yi-shen Chen et al. (interview) and Jing-ling Wang et al. (record),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Kuo Ting-ye by His Disciples and Friends*.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楊翠華

1999 〈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2): 41-103。(Yang, Tsui-hua, 1999, "Wang Shih-chieh and Sino-American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Exchange, 1963-1978: Aid or Cooperation?"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29(2): 41-103.)

劉曉鵬

2013 〈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 145-174。(Liu, Philip Hsiaopong, 2013, "Assembling Scholar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The Prequel to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7-197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2: 145-174.)

蔣經國

- 1988 《危急存亡之秋》。臺北：正中書局。(Chiang, Ching-kuo, 1988, *Perilous Times*. Taipei: Cheng Chung.)
- 1992a 〈革命核心的力量〉，見張良任（總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四冊，頁 168-169。臺北：行政院新聞局。(Chiang, Ching-kuo, 1992a, “The Core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pp. 168-169 in Liang-ren Chang and Editorial Board of Collections of Mr. Chiang Ching-kuo (eds.), *Collections of Mr. Chiang Ching-kuo*, Vol. 4. Taipei: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Executive Yuan.)
- 1992b 〈貫徹領袖的精神意志與幹部政策〉，見張良任（總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四冊，頁 386-387。臺北：行政院新聞局。(Chiang, Ching-kuo, 1992b, “Implementing Thoroughly the Leader’s Will and Cadre Policy,” pp. 386-387 in Liang-ren Chang and Editorial Board of Collections of Mr. Chiang Ching-kuo (eds.), *Collections of Mr. Chiang Ching-kuo*, Vol. 4. Taipei: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Executive Yuan.)

B. 外文部分

Adler, Emanuel and Pater M. Haas

- 1992 “Conclus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Order,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flective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1): 367-390.

Archiv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1966 “Joint Communiqué Adopted by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ne 19, 1966),” *Wang Shih-chieh Files, Archiv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王世杰個人檔案》), File Number 302-01-01-05-011.

Ashley, Richard K.

- 1986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pp. 255-300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um, Richard

- 2010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Bettiza, Gregorio

- 2014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pping the Field and Advancing a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Line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6(1): 1-28.

Bigo, Didier

- 2011 “Pierre Bourdi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of Practices, Practices of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5(3): 225-258.

Chen, Titus C.

- 2014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An Obscure Legacy of Chen-tsai Wu in Trans-Pacific China Studies,” *Issues & Studies* 50(1): 89-121.

Cox, Robert W.

- 1986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pp. 204–254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ull, Nicholas J.
2008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zalay, Yves and Bryant G. Garth
2011 “Hegemonic Battles, Professional Rival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Market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tate-Governing Expertis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5(3): 276–293.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2001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391–416.
- Gaddis, John Lewis
1992/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3): 5–58.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zzini, Stefano
2000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2): 147–182.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521–541.
- Haas, Peter M.
1992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1): 1–35.
- Hamati-Ataya, Inanna
2011 “The ‘Problem of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From Applied Reflexivity to Reflex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2): 259–287.
2012 “IR Theory as International Practice/Agency: A Clinical-Cynical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0(3): 625–646.
2013 “Reflectivity, Reflexivity, Reflexivism: IR’s ‘Reflexive Turn’—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 669–694.
2014 “Transcending Objectivism, Subjectivism, and the Knowledge In-Between: The Subject in/of ‘Strong Reflexiv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0(1): 153–175.
- Herman, Robert G.
1996 “Identity,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271–316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2008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1): 129–153.

- Keohane, Robert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4): 379-396.
- Kou, Chien-wen
2014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s China Studies: Trajectories and Dynamics," *Issues & Studies* 50(1): 9-53.
- Lapid, Yosef
1989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3): 235-254.
- Lebow, Richard Ned
1994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 249-277.
- Liu, Philip Hsiaopong
2014 "Gathering Scholars to Defend the Countr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fore 1975," *Issues & Studies* 50(1): 55-88.
- Madsen, Mikael Rask
2011 "Reflex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bject: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5(3): 259-275.
- Onuf, Nicholas
1998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pp. 58-78 in Vendulka Kubáľ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 Oren, Ido
2003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ren, Ido and Ty Solomon
2013 "WMD: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New Political Science* 35(1): 109-135.
- Pettman, Ralph
2000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Armonk, NY: M. E. Sharpe.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1999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 Steele, Brent J.
2007 "Making Words Matter: The Asian Tsunami, Darfur, and 'Reflexive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4): 901-925.
- Vogel, Ezra F.
2004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Retrieved July 1, 2015, from <http://conferences.usc.cuhk.edu.hk/Images/40thAC/EzraVogelKeynoteSpeech.pdf>

Constructing an Inter-Subjective Imaginality: Analyzing Taiwa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China Studie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53-1975)

Titus C.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Founded in 1953,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s a renowned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Cold War, however, IIR was an intelligence analysis unit of the ruling Kuomintang government, maintaining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aiwan'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Beginning in the mid-1960s, IIR was further tasked with conducting foreign propaganda, by providing authorit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sightful analyses abou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to selective China specialists in the West. This article applies reflexive constructivism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conditions, rationales, mechanisms, and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of IIR's institutional-func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IR not only lends much-needed impetus to the Cold War Studies in Taiwan, but also helps to reflect on, and further problematize, the knowledge-power relations upon which scholars of China Studies conduct research in today's Taiwan.

Key Words: constructivism, reflexivism, power-knowledge relations, Cold Wa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a Sinica